

《红色中华》：“运动中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喉舌”

□ 徐尚思 徐方平

1927—1937年，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的10年苏维埃运动，尽管艰难坎坷，但取得了重大成果；成功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新篇章。这场运动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领导的苏区三四十种报纸的积极宣传和舆论引领。而《红色中华》是这些报纸中最为重要的报纸，发行量最高达到4万份，真正“成为了全苏区人民一个喉舌”。同时，因为这场运动随着红军长征扩展至10余个省，所以，该报堪称“运动中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喉舌”。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开启90周年之际，进一步深入研究《红色中华》报，总结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迪。

瑞金版《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934年10月)，存在了近3年时间。它最初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性质问世的，铅印4开1张。第1—49期为周刊，自第50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国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3日刊，第148期以后再改为双日刊。1934年10月3日出版第240期后，因红军长征被迫停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全国领导了南昌起义等100多次武装斗争，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向乡村转移，苏维埃运动由此拉开序幕。1931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4周年之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会议闭幕仅20余天，即12月11日，由王观澜任主编的《红色中华》报就和读者见面了。其创刊的宗旨非常明确：“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中华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通过对苏维埃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大规模的红军和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等动员宣传，以及民主监督工作，最终“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

瑞金版《红色中华》报，刊发党和各级政府的公文是其首要的任务。据统计，这期间共刊发了至少473则党和各级政府的公文，平均每周刊发2则，成为发布领导文件和政策指导的重要渠道。例如，创刊号在显著位置刊发了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号公告，公布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以及临时中央政府的外交、军事、劳动、财政、教育、内务、司法、工农业检察院等苏维埃政府建设的新闻、社论、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报道等。

《红色中华》专门设置《苏维埃建设》《苏维埃法庭》等栏目，刊发大量关于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等苏维埃政府建设的新闻、社论、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报道等。关于政治建设，特别引人瞩目的反贪污腐败的宣传报道。1932年3月2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项英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强调指出：“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允许的事，如若发生，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1933年12月15日，又发表了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为苏区严厉打击贪污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1934年2月，第151期《红色中华》对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以及其他问题被“处以枪决”一案的公审情况，并对有关人员分别处以监禁、苦役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报道。同年3月27日，发表了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统计了反贪污斗争的成果：共查出贪污罚款2053元，送交法庭制裁的29人，3人被开除公职。这些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府令行禁止，严惩贪污腐败和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追求。

关于经济建设，《红色中华》重点刊发了许多大张旗鼓开展农业生产情形的文件、文章和通讯稿。例如，在宏观层面，1933年7月，中央政府通告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认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尖锐批评了因为战争忙，‘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要等战争完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错误观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在微观层面，积极报道了各地查田、

春耕、秋收等农业生产活动，设置《红板》栏目表彰先进，《突击队》栏目批评落后。文风朴实，文字简练，深受群众喜爱。1933年3月，刊发了《春耕运动的实际检阅》，表扬了红军政治部全体教员支援春耕和武阳区春耕取得的成绩。当然，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突击队》专栏后来更名《铁棍》《铁锤》和《无产阶级的铁锤》，有的批评性报道与事实不符，火药味过浓，妨碍了团结。

关于军事斗争，《红色中华》则通过重点报道红军战争和战役的胜利、人民群众无私支援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失败，来振奋士气，鼓舞民心，最终传递苏维埃红色政权是完全可以存在和发展的胜利信念。为了真实生动、亲切感人，有许多报道是前线将士通讯员撰写的，群众语言味道浓烈。例如，1933年7月，《赤色战士通讯》栏目发表了《占领潮子营的经过》短文，幽默风趣，可读性极强。同时，还发表了《溪口乡二个李同志》的短讯，称：“福建长汀县四都区溪口乡中有两个顶呱呱的女同志李生连、李连清”，在党团支部大会上和各群众团体联席会上，鼓动大家“报名参加红军，把自己所做的草鞋、干粮袋，送给报名的新战士，并愿意帮助他家的一切困难，看呵，这两个妇女同志真是好极了！”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瑞金版《红色中华》停刊。赣南版《红色中华》在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的主编下，至少出版了24期。而跟随党和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的长征后，《红色中华》于1935年1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毛泽东十分重视它的复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发表了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贼》的文章，指出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关于外交方针的演说，是“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

陕北版《红色中华》(1935年11月—1937年1月)，仍沿用原来的期号，继承和发扬了瑞金版《红色中华》办报的党性原则和群众办报的风格，努力宣传党和政府关于苏维埃运动政策的新变化，不仅在地理位置方面实现了由南向北运动的转变，而且在宣传内容方面实现了由“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等运动的转变，努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月27日，为了积极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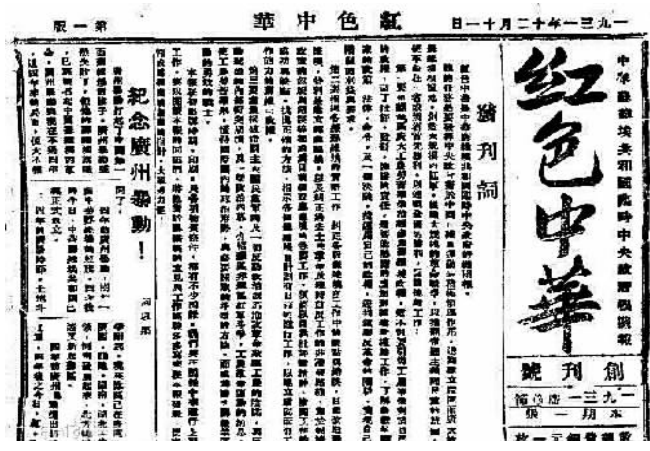
传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明确指出：党的“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动员“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最后“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同时“要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各种政策的改变”。《红色中华》根据中央的宣传要求，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了有效的宣传。不管是反蒋还是抗日，党都必须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1936年1月至7月，《红色中华》配合各级政府实施的“扩红”运动及发展地方武装运动，刊发了100多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作用。同年9月，随着中共中央提出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变化，《红色中华》刊发的文章一律停止了对蒋介石“卖国贼”等斥骂。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中华》广泛采用各种形式来加强宣传效果，运用歌曲的形式，就是其中之一。《红色中华》第294期发表了一首《欢迎二、四方面军歌》，其中有“二、四方面军好英雄，北上抗日下决心。胜利向前进”“红军团结万万岁……抗日胜利万万岁！”等铿锵有力的歌词，并在歌曲旁加按语：要求每一个苏区民众，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要把它唱熟，为团结抗日而奋斗！两个月后，《红色中华》第306期又发表了一首《民主共和国进行曲》，核心意思是“三个一”：“全国的人，一条心，我们要争取，争取中华

民族的独立平等！全国的嘴，喊着一个声音，我们要打倒，打倒卖国汉奸和强盗日本！全国的眼睛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我们要实现，实现中国民生共和，创造人民的新生。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这些歌曲发出救亡图存的时代最强音，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使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广泛的认可。

上述事实表明，陕北版《红色中华》比瑞金版《红色中华》在践行党报中设立通讯员，在地方建立由3至5人组成的读者会，由读者会向群众解释报纸的宣传内容。总之，《红色中华》有效地传播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延安时期党的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苏维埃运动的星星之火最终在中华大地燎原，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传媒引领社会思潮研究”(15AKS009)的阶段性成果)



《红色中华》创刊号

资料图片

国家认同：历史教育的基本诉求

□ 张汉林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国家的心灵性活动”。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国家认同不仅未遭削弱，反而日益重要，因为国家仍是国际生活的基本单元，人们仍惯于用民族国家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尤其重要，对于我国统一安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不断推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在这方面，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以及党史、国史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历史教育是增强国家认同的主要途径，如何在历史教育中有效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下，无论是西方大国，还是东亚邻国，均在不同程度地强化历史教育。上世纪90年代，一向尊重地方教育自主权的英国和美国相继颁布了国家历史课程标准，历史课还成为美国基础教育的五大核心课程之一，历史教育的地位得以大大提升。作为联邦制国家，澳大利亚长期推行教育地方自主的体制，大力定期设置综合课，没有独立的历史课。为强化“澳大利亚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澳大利亚政府逐渐认识到历史教育的独特作用。2010年，澳大利亚步英美之后尘，颁布了该国历史上首部国

家历史课程标准，独立开设历史课，并要求各地自2013年开始全面实施。法国更不必说，法国人常以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而自豪，国民普遍对历史怀有浓厚兴趣，视历史教育为国际生活的基本单元，人们仍惯于用民族国家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尤其重要，对于我国统一安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不断推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在这方面，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以及党史、国史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历史教育是增强国家认同的主要途径，如何在历史教育中有效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属机构“国史编纂委员会”负责编写，并决定于2017年在全国推行。2016年3月，韩国规定所有考生在高考中必须考韩国史。此外，《韩国公务员任用考试令》则规定韩国史是韩国公务员考试各个层级的必考科目。

由此可见，强化历史教育是当下的某种趋势。世界各国为了国家利益和国际竞争，都在强化国家认同教育。而历史教育塑造国民的历史记忆，深度影响国民对“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的国家”的认识，对建构国家认同至关重要。由此，世界各国不约而同选择了对历史教育的干预。区别仅仅在于，诸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各异，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当然，政府对历史教育的干预，也有一个方向和尺度的问题。例如日本政府对历史教育的干预方向与尺度，就导致了不少历史学者、历史学家的担忧与不满。

政府对历史教育的干预，实际上是在影响青少年的历史记忆，通过对青少年应该“记住什么”和“遗忘什么”施加管控，进而建构社会所需要的国家认同。记忆不仅与过去紧密相连，更与未来息息相关。过去只是记忆的对象和资源，决定该“记住什么”和“遗忘什么”的，却是主体对于未来的期望。

对于个体而言，记忆是塑造个体身份的重要力量，是个体存续与发展的源泉。遗忘记忆的人生是无法想象的。对于群体来讲，记忆是制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缺乏共同记忆的国家，将会是一盘散沙，国家认同无从谈起。因此，各国的历史教育均对记忆抱以厚望，在该“记住什么”等问题

上给予关注。如美国在制定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的过程中，在该“记住什么”这个问题上，社会各界人士展开了一场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支持的人认为标准真实地反映了美国历史发展中的成功与失败，各种不同群体都得到了书写；反对的人则认为标准过分渲染了美国历史上的阴暗面”(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也就是说，关键问题在于美国少数族裔的历史是否应该成为学生的集体记忆，美国历史上的错误与失败是否应该为学生所铭记，归根到底，这涉及学生对“美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理解。

遗忘和记忆一样，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形式。甚至可以说，没有遗忘就没有记忆；选择遗忘什么就是在选择记住什么。记忆与遗忘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对于国家认同来说同等重要。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将遗忘分为七种形式：自动遗忘、为保存而遗忘、选择性遗忘、破坏性遗忘与镇压性的遗忘、保护加害者的防御和共谋性遗忘、建设性遗忘、治疗性遗忘。其中，前三种属于人类自然的心理意识，价值中立；第四、五种是负面消极的控制行为；第六、七种则是积极主动的努力。按照这种划分标准，日本历史教育中不乏保护加害者的防御和共谋性遗忘。以藤冈信雄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对日本的许多侵略罪行并不否认，但他们认为历史教育应该“灌输我们国家的历史自豪感”，学校不应传授那些让学生羞愧地抬不起头来的历史知识，从而摧毁学生对国家

的认同(劳拉·赫茵等《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和记忆》)。因此，回避事实、选择遗忘进而走向歪曲事实就成为他们主张建立新的、正面的国家认同的武器。

与日本人对二战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人对二战的态度。后者对二战的态度之所以受到世界的赞誉，是因为德国的历史教育适时与恰当地推行建设性遗忘和治疗性遗忘。实际上，德国人对二战的记忆也有过曲折的历程。战后初期的阿登纳时代，德国历史教育对纳粹德国罪行的心态十分矛盾，避免反思那些难以接受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德国才开始正视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自我检讨。但德国历史教育的真正特质的关键在于擅长同时使用记忆与遗忘。1985年，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受到各方的一致好评，其缘由正在于此。演讲的核心主题是：看待“没有歪曲的事实”的重要性；演讲者之所以要直面没有歪曲的事实，是为了让德国公众遗忘并且被原谅(M.莱恩·布鲁纳《记忆的战略：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修辞维度》)。德国人在记住与遗忘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既正面促进了德国人的国家认同，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与尊重。

“灭人之国，先去其史”。今天世界各国历史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各国成功或不成功的做法都在提醒我们，国家认同是历史教育的基本诉求。当然，我们在历史教育中致力于构建国家认同时，也不能忽视国际理解教育和学生人格教育。国家认同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结合起来，才不会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教育以学生人格教育为基础，才是内在的和可持续的，这样的历史教育才是健康和健全的。(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党史随笔

与著作

□ 张太原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对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加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的通知》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的深刻意义，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纳入“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重要内容。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在今后常态化制度化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应该继续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并“融入日常”，用在经常。为把学习推向深入，真正把握《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精髓，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所论述的整个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思想方法是人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认识问题的门径与方式，工作方法是人们改造世界、社会实践和处理事务的路径与手段。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及治国理政的过程中经常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曾说：“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作为领导者，“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假如”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176页。)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困苦中脱颀而出，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各种奇逆般的成功，与他向来重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研究与总结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曾撰写和发表过一系列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关的文章和讲话。在他看来，思想方法和和工作方法是领导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领导工作的成败。因此，“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工作方法，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容易发生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0页)而“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思想方法”要对头，不能只考虑一种方法，要经常考虑几种方法来比较，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实际上，快或慢中也有辩证法，快，不一定好；慢，不一定差。而好和差也是相对的，从一个角度看是好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就是差；此时为好，彼时可能就是差。做领导者，能不慎重乎？”

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其大敌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坚持正确的工作方法，就要进行调查，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实践，分清主次，齐头并进，其大敌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分散主义。两者紧密相连，互为表里，1985年，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受到各方的一致好评，其缘由正在于此。演讲的核心主题是：看待“没有歪曲的事实”的重要性；演讲者之所以要直面没有歪曲的事实，是为了让德国公众遗忘并且被原谅(M.莱恩·布鲁纳《记忆的战略：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修辞维度》)。德国人在记住与遗忘之间进行微妙的平衡，既正面促进了德国人的国家认同，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谅解与尊重。

毛泽东所论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非常细致和全面的。以面对一项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任务或工作为例，那么在寻求“解决”之道的时候，要“从调查研究入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与个别相结合”，“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同时要“多与人商量”，“认

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当断则断”，等等；而在完成任务或工作的时候，要“只唱一出《香山记》”即抓中心和重点，“学会弹钢琴”即统筹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有了问题就开会”，“抓而且紧”，“检查评比”，“总结经验”，“赔一个不是”，等等。如此，形成了一套方法之链。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要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正如他常说的“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凡事只有干起来才能真正地懂得如何来干，也正如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同样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

在这样的过程中，还要“善于总结经验”，毛泽东曾说，每打一下仗，都要总结一下，弄清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对错误的态度，要知错即改，不能将错就错。令人可能想不到的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整风运动中发生的偏差，多次认错，道过歉，仅在中央党校就曾三次表示“赔一个不是”。作为领导者，批评下属或别人往往很容易，但是批评自己或上级则很难。现实生活中，许多领导干部就是因为没有做到这一点，而逐渐酿成苦果。毛泽东把“有无私人的自我批评”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可见其对党的重要性。去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习近平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这也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一个重要要求。

毛泽东常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毛泽东论述的思想方法和和工作方法，既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又是他对党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方式，其中不乏中国传统智慧和方案。今天毛泽东所提倡和运用的思想方法和和工作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日常生活中，直接产生作用的就是思想方法和和工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正确地运用思想方法和和工作方法的结果。在新的历史时期，只要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党带领人民就能做到既有定力应对困难，又有勇气开拓创新，从而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作者系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942 邮箱：gmrbds@163.com